

中国 农村 研究

CHINA RURAL
STUDIES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集刊
中国期刊网（CNKI）入选集刊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

2016年卷·上

华 中 师 范 大 学 中 国 农 村 研 究 院

中国 农村研究

CHINA RURAL
STUDIES

2016年卷·上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农村研究. 2016 年卷(上) / 徐勇主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12

ISBN 978-7-5161-9681-6

I. ①中… II. ①徐… III. ①农村经济—研究报告—中国—2016
IV. ①F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05114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冯春风等
责任校对 张爱华
责任印制 张雪娇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8.5
插 页 2
字 数 313 千字
定 价 7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农村研究》编辑委员会

主 编 徐 勇 邓大才

执行主编 刘义强

编 辑 李海金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 文	马 华	邓大才	王 静	王 勇
王义保	石 挺	卢福营	冯春风	刘义强
刘金海	刘筱红	李海金	朱敏杰	任 路
汤晋苏	何包钢	应小丽	吴晓燕	陆汉文
陈军亚	杨 嬛	张晶晶	张向东	郝亚光
徐 勇	徐 剑	徐小青	徐增阳	董江爱
黄振华	詹成付	彭正德	熊彩云	

目 录

土地改革中的乡村社会

政治动员与社会关系：土地改革中阶级意识的塑造与阻滞

——基于对山东古邵镇土改口述史的调查

..... 陈国申 张 毅 (3)

从“差巴”到“星巴”：西藏土改中的“身份革命”

——以拉萨市格老窝村 8 位“差巴”和 1 位“朗生”的

口述史调查为例 吕进鹏 (17)

贫困的政策框架与形成机理

我国脱贫攻坚若干前沿问题研究 黄承伟 (39)

农民贫困心理的形成机理研究：扶持政策的限度

——以陕西省焉头村为个案 张利明 (55)

农村教育贫困的产生机理与政策思考

——基于冀南孔家寨村的调查与研究 陈爱青 (76)

农地流转与农户行为

农地确权政策对农户农地流转决策行为的影响分析

——基于津鲁两地农户调查问卷的实证研究

..... 许恒周 张中举 田浩辰 (101)

农村土地流转中农民土地承包权益研究

——基于湖南西部隆回县 18 个乡镇的调查 贺文华 (113)

回溯与反思：乡村土地实践的社会逻辑 崔腾飞 (136)

村民自治与社区服务

自治权下移：村民自治回归的创新模式

——以清远市为例 王 猛 乔海彬 邓国胜 (153)

运动式社区服务的逆向观察

——基于鄂东四村的调查 罗 峰 (167)

农民的身份、婚姻与保障

社员的演变和集体所有制的终结

——基于浙江村经济合作社股份制改革的分析 潘学方 (193)

社交媒体功能异化与现代婚姻两性关系

——以泸州市农民工为例 王 飞 (211)

海外农村基层治理

与狮共舞：政府主导下的社会治理模式

——新加坡的基层社会治理及其经验启示 任 路 (229)

以市场和社会“双主导”的基层治理模式

——基于香港基层治理模式的考察报告 唐丹丹 (240)

社团政治：社会主导的基层治理模式

——基于澳门社会治理模式的调查与思考
..... 党亚飞 孔 浩 (247)

乡村深度评论

政治动员与农民行为研究的四个视角

——基于研究述评基础上的学理反思 沈乾飞 (259)

书 评

农民现代化的政治心理维度

- 读刘伟《普通人话语中的政治：转型中国的
农民政治心理透视》 曹龙虎 (277)

民心：进入中国乡村的学术路径

- 评刘伟《普通人话语中的政治：转型中国的
农民政治心理透视》 肖 波 (283)

土地改革中的乡村社会

◆ 政治动员与社会关系：土地改革中阶级意识的塑造与阻滞

土地改革是中国革命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共产党巩固政权的关键步骤。土地改革的开展伴随着共产党对乡村社会“阶级意识”的输入，通过动员与阶级教育，共产党将阶级意识植入乡村社会，打破了传统乡村社会的意识形态，激发了广大农民群众的阶级情感和革命热情，重塑了乡村社会的政治关系，巩固了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本文通过对山东省古邵镇部分村民进行土改口述史调查，掌握第一手资料，针对古邵镇农民在土地改革运动中表现出的阶级意识的差异进行分析，提取影响阶级意识的两大对抗力量，试图通过“政治动员—社会关系”对抗模型，解释阶级意识差异的原因。

◆ 从“差巴”到“星巴”：西藏土改中的“身份革命”

领主土地占有制基础上的庄园经济与农奴政体决定了传统西藏社会，实质上就是由领主阶级和农奴阶级组成的身份符号系统。然而，发端于1959年3月的“土地改革”（泛称“民主改革”）推翻了传统等级特权社会，百万农奴获得人身自由、分得土地和牲畜。那么，这一身份的革命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带着这样的疑问，笔者走进西藏农村田野，深入拉萨市墨竹工卡县扎雪乡格老窝村寻访当年经历过土地改革的老人，通过该村9位老人的口述史调查，再现历史的原貌，试图发现关乎土地的底层农奴阶级与上层领主阶级之间的博弈规则与身份再造过程，并以此来认识土地改革作为关节点对于西藏社会历史造型的重要影响。

政治动员与社会关系： 土地改革中阶级意识的塑造与阻滞

——基于对山东古邵镇土改口述史的调查

陈国申 张 毅

(山东农业大学地方政府与乡村治理研究中心 山东泰安 271018;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 湖北武汉 430079)

内容提要：土地改革是中国革命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共产党巩固政权的关键步骤。土地改革的开展伴随着共产党对乡村社会“阶级意识”的输入，通过动员与阶级教育，共产党将阶级意识植入乡村社会，打破了传统乡村社会的意识形态，激发了广大农民群众的阶级情感和革命热情，重塑了乡村社会的政治关系，巩固了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本文通过对山东省古邵镇部分村民进行土改口述史调查，掌握第一手资料，针对古邵镇农民在土地改革运动中表现出的阶级意识的差异进行分析，提取影响阶级意识的两大对抗力量，试图通过“政治动员—社会关系”对抗模型，解释阶级意识差异的原因。

关键词：土地改革 阶级意识 政治动员

一 中国土地改革的研究述评

大革命失败前夕，毛泽东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充分估计了农民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巨大作用，指出了在农村建立革命政权的必要性，从此，如何争取农民、建立革命政权，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革命工作的重心。为了更好地发动农民群众，中国共产党对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进行了不懈努力和探索。通过发动土地改革运动，实现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向农民土地所有制的转变，改变了传统乡村社会的权力结构，完成了

共产党权力触角向乡村社会的渗透,取得农民对新政权的认同,实现了中国农民思想意识由小农意识向阶级意识的转变,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心理基础。

中国共产党领导土地革命并取得重大胜利的这一历程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许多学者对土地改革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出版了不少著述。胡伊默所著《土地改革论》(中华大学经济学会 1949 年版)和孟南所著《中国土地改革问题》(新民主出版社 1949 年版)可以算是国内较早期土地改革研究著作的代表。这一时期的作品大多是为了宣传党的土地政策和论证土地改革的合法性,使广大群众接纳并支持土地改革运动。20 世纪 50 年代,一些海外学者也开始关注中国农村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1959 年出版的《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中,柯鲁克夫妇讲述了十里店在 1937 年至 1947 年间,抵抗日本侵略者,推翻传统封建土地制度,耕者获得土地的过程,显示出农民阶级意识的萌芽。^①续篇《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记述了在共产党领导下十里店进行土地复查和整党运动的情况。柯鲁克夫妇于 1959 年和 1960 年回访十里店,将所获见闻整理成《阳邑公社的头几年》一书,1966 年在英国出版。^②同年出版的韩丁所著《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记录了张庄人民打破封建枷锁,获得翻身解放的曲折过程,赞颂了土地改革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现实意义。^③这批较早对土地改革展开研究的外国学者,多是以观察家、新闻记者等身份亲身参与了土地改革过程,其作品便是对亲身经历的记述,着重分析土地改革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影响。

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土地制度变动,中国乡村社会发生巨变,对土地改革运动史的梳理成为学术界的研究重点,涌现出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赵效民主编的《中国土地改革史(1921—1949)》采用史论结合的方法,着眼于研究土地改革在旧中国土地变革和生产力的发展中发挥

① Crook, Isabel, and David Crook, "Revolution in a Chinese village: Ten Mile In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59).

② Ward, Marion W., Isabel Crook, and David Crook, "The first years of Yangyi Commune",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1966).

③ Hinton, William, "Fanshen: a documentary of revolution in a Chinese village",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66).

的影响和作用,强调将土改史写成经济史,作为专门的经济史来研究。^①党内资深的农村问题专家杜润生先生的回忆录《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从党内领导决策层面将土地政策的调整与施行过程,尤其是合作经营向家庭承包制转变这一历程进行了详细梳理。^②这一时期的相关著作对土地改革运动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厘清了土地改革运动的来龙去脉,以及各时期土地政策产生的效果,对土地改革运动中的经验教训也做了客观、翔实的总结,为此后的学术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最近几年,对土地改革的研究呈现出一种新的趋向,越来越多的青年学者把土地改革与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等学科相勾连,多学科多角度分析土地改革运动,提升了土地改革运动的学术研究价值。代表作品有:王友明《莒南县土地改革研究(1941—1951)》(2004年)、黄荣华《农村地权研究:1949—1983——以湖北省新洲县为个案的考察》(2004年)、李金铮《土地改革中的农民心态:以1937—1949年的华北乡村为中心》(2006年)、彭正德《土改中的诉苦:农民政治认同形成的一种心理机制——以湖南省醴陵县为个案》(2009年)、李里峰《革命中的乡村——土地改革运动与华北乡村权力变迁》(2013年)、王燕霞《新形势下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研究》(2014年)等。近年来,土地改革运动的研究者越来越重视口述资料的运用,以某一乡村或县镇为个案,多采用党和国家对乡村社会动员的视角,以政治动员、基层政权建设、阶级话语等为主线论及其对乡村社会产生的影响,研究范围和深度不断拓展,在土改微观史方面成果显著。

通过对土改研究学术史的简单梳理,可以发现学者们较常采用自上而下的研究路线,重点关注于土地政策的执行效果及国家对于乡村社会的影响。以农民为主体的研究成果近几年有增加的趋势,但多着眼于农民政治心理在整个土地改革运动中的变化过程,忽略了同一时期阶级意识在农民个体上呈现出的差异。本文正是以农民为主体,采用个案调查的研究方法,以古邵镇农民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呈现出的积极主动参与和消极被动参与的差异表现为突破口,从政治动员与乡村传统社会关系切入,探究同样的社会大环境下农民阶级意识差异的原因。

① 赵效民主编:《中国土地改革史(1921—1949)》,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② 杜润生:《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二 古邵镇农民在土地改革中阶级意识的表现

古邵镇位于山东省枣庄市峄城区最南部，京杭大运河北畔，区位优势，交通发达。根据中共中央“五四”指示精神，该地区于1946年进行土地改革试点，土改工作队驻村指导，土地改革运动进行了不长时间就遭遇国民党反攻，共产党实施战略性北撤，土地改革被迫中断，此时古邵镇大部分村庄均未开始土地改革运动。1948年全区解放，土地改革继续开展，直至1951年土地改革运动全面完成，土地证发放到位。本文中所涉及的个案调查均在此时间范围内。

（一）斗争“主力”与斗争“看客”

周永海，1934年生于峄县棠阴，4岁时因父亲去世随母亲迁回父亲老家大王庄村。5岁那年逃脱“鬼子”的劫掠，举家迁至涧头集，后返回大王庄村，但因生活难以为继，与母亲外出逃荒讨饭过生活，直至1946年第一次解放时才回到大王庄村。

“那年在峄城，我才十来岁，我上俺大姐那儿过春天，人家城里的学生游行示威，打洋鼓吹洋号，说八路军快来到，那是我第一次听说共产党，听说要进行土地改革。”周永海因常年在外生活，较早的获知了土地改革的信息。1946年，大王庄村第一次解放，土改工作队进村指导土地改革运动。“工作队是东北赵宝县的，徐豁牙子还有一个刘玉荣，这两个人第一次解放来大王庄就住在我这儿。”“工作队最喜欢我这样的穷光蛋。我整天和他们在一起，都很熟，后来北撤的时候我还给他们帮过忙。”周永海虽然当时年龄不大，但因为与工作队员长时间的密切相处，阶级觉悟提升很快，第一次解放就是村里的土改积极分子，加入了共青团，担任儿童团团长，在工作队的带领下到处比歌、表演。1948年全面解放时周永海担任民兵，虽然年龄小，但每次开会都积极发言，带领贫雇农斗地主。“当时共产党工作队来靠就靠咱贫雇农，贫雇农之间咱是一块儿的，得串联，和贫雇农敌对的，咱得保密啊，打造贫雇农一家人。”“这个庄上姓孙的是大户，还有姓李的，姓姜的，我们姓周的数不着，当时和他们也没有什么交集，那时候小民小户的，没有共产党上哪儿讲理去。土改我一点也不担心，有心眼小的分给他土地，他还不肯要。我就不怕，大不了不在这里待了。”“我是第一个诉苦的，把旧社会受的苦都说了，斗地主那更

得带头，贫雇农得团结，才能把地主打倒。”周永海在土地改革中被划为贫农成分，但是他仅仅保留了土改前的土地，没有接受其他的分配，他说：“一共就几犍牲口，庄上贫农户困难户多，一解放一土改我的条件比以前强了，那些都让大家伙摊，咱不要。”周永海因为在土地改革中表现积极，1949年成为该村第一位中共党员，并在1951年担任互助组组长，1954年担任初级社第二社社长，1956年担任高级社社委会七大队大队长，1962年起担任大王庄村书记直至退休。

与大王庄村相邻的小王庄村有一位褚衍田老人，他经历过与周永海相似的穷苦生活，但在土地改革中表现出的阶级意识却与周永海有着明显差别。褚衍田，1929年生于马庄村，1930年，由于村庄遭受土匪抢劫，举家逃难，投靠舅家，搬迁至小王庄村。

“这个庄上我叫舅的多，土改之前对俺都不孬，要不怎么能偃^①这边来呢。断了顿实在没有都能给点儿。咱不能没良心，人家对俺都不孬。这个村主要是姓刘的，还有姓王的，其他都是逃荒户偃这庄上来的，都是偃亲戚来的。”褚衍田老人在很小的时候就投奔舅家生活，12岁开始就给舅家放牛，在舅家干活。平日里家里断了粮，舅家都会给予救济，关系还算融洽。老人称1946年前并未听说过土地改革的消息，1946年工作队下村后就是听工作队的安排。“那都是工作队，你不当家，工作队来到叫你么着你就怎么着。”“工作队叫你干吗你干吗，他来到就找你贫下中农，像俺这样的，我那会儿才十七八岁，叫你干什么你就去干，叫你扒粮食去你就扒粮食去，明天上级又有指示他就再来。”“哪有什么串联，你是个贫农给你说了，怕你和地主富农有关系，你再通风报信。”从老人的讲述中，可以发现小王庄村土改前期的政治动员工作做得不是很充分，并没有完成对农民阶级意识的构建。“我没诉过苦，因为我觉得都挺好，咱不能给人添罪。开会没发过言，光在下面听人家说。”“划分阶级由工作队掌握着，大家伙商议，但你不知道是干吗的。工作队就给你讲，你按这个杠杠，识字的会计写，他给你数，叫你商议谁有多少地。你光知道这个，你不知是干什么。俺城里那个大外老爷^②，被划成地主成分，他没有地是个

① 偃：指依傍、依靠的意思。

② 外老爷：指外祖父的意思。

商业地主，也没什么钱。他说‘划我个地主我还怪滋儿^①来，我没有地还划我个地主，名儿多好听’。赶等弄完了，帽子一戴不是的喽，有罪受喽。”褚衍田老人在土改中被划为贫农成分，其舅家被划为地主，老人虽然分到了五亩地和两间房，但访谈中并未感受到老人的喜悦，表示都是听从工作队的安排，没有什么意见。褚衍田1946年成为共青团员，但并未入党，他说：“叫我入党来着，咱一个是没文化，再一个咱的思想是不想得罪人，所以我没入党，舅家成分不好，也不好开展工作。”

（二）嫁过来的“女强人”与嫁过去的“老实人”

郭秀英，1930年出生于枣庄滕县，1947年嫁到古邵镇沈桥村。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年起任村队妇联主任。1979年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奖章。

郭秀英是在沈桥村开展土地改革运动的前两年嫁入沈桥村的，但她出嫁前在滕县就接受过土地改革的宣传教育，形成了一定的阶级意识。在沈桥村开展土地改革运动时作为一名积极分子，表现突出，很快就成为党组织的培养对象，并于1949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该村第一位地下党员。“作为积极分子，首先开会得认真，得带头发言，‘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先引个头出来然后就都说了。其次得听上级的安排，人家说斗哪个就领着头斗。我因为嫁过来时间不长，对村里情况了解得少，平时就负责挨家挨户动员小青年，动员妇女，开会的时候主要负责维持现场秩序。”“发动妇女，这古邵镇的庄我都劝过来了，没有一个没劝的。背着煎饼卷子，去人家也不在人家吃饭，自己背着。”郭秀英一直是当地人眼中的“女强人”，性格坚忍，办事风风火火。郭秀英对于土地改革也有着自己的认识：“土地改革是让穷人翻身，为穷人服务，替穷人做主的。地主被批斗那都是因为他剥削穷人，都是‘驴打滚’的利，哪有不恨他的。穷人没有替地主说话的，替他们说话那就是站错队，犯的是阶级错误。”

与郭秀英同为中农成分且同为女性的张忠兰，在土改中就表现出了不一样的阶级意识。张忠兰，1933年出生于古邵镇孝庄村，1951年嫁到邻村土楼村。

张忠兰是一辈子务农的“老实人”，在土地改革中一直处于被动的状态。“土改之前虽然是各家过各家的日子，但是吃不上时候也能借点儿，都是问

^① 怪滋儿：指很开心、挺高兴的意思。

亲戚借，也不要利息。”“我们家和村里其他人关系都不错，没有什么矛盾，活忙不过来也相互帮着，管顿饭，不要钱。”土改前，孝庄村没有特别富裕的大户人家，村民关系融洽，联系密切。“土改的时候上级来人了，没到咱家里来，我见过他们，但不知道从哪里来的。”“那时候天天开会，开始都去，后来有事的就不愿意去了，一家去一个，都上那坐着等着听就是了。”老人在土地改革中的态度基本就是听上级安排，并不表示关心。“地主要是作恶的人就斗，不作恶的也不斗，看你人情好不好，看你为人怎么样。要没人告没人提还斗他吗？”在老人看来决定地主命运的是“人情”，并没有阶级的概念。划成分斗地主结束后，老人说村里人的关系还是和之前一样，并没有形成阶级差异，“他划是他划的，搁亲处邻还是那样，都是老亲世邻的”。老人的娘家在土改中被划为下中农，婆家的成分是老中农，由于中农既不往外分地也不能摊地，并且两村往来比较密切，张忠兰与两村村民都熟识，所以张忠兰在两村的土地改革中都是被动的旁观者的角色。

（三）主动捐地与怨恨分地

土楼村的褚夫俊老人生于1933年，祖辈靠木匠手艺置办了一顷多地，是村里的大户，老人从小就在地里帮忙干活。

土楼村面积不大，土改前只有18户人家，村里都是褚姓一家人，有困难都是互相帮衬，非常讲究情义。“1946年就有土改工作队到村里来宣传，来了四五个人，都是赵宝县的，就是那时候听说要土改的。”1946年褚夫俊得知要土地改革的政策后，就主动将自己土地捐了出来，他说：“反正咱自己家也种不了，不如把地拿出来，大家都是亲戚，别人还能念着你的好。”1948年第二次解放再次进行土地改革时，土楼村大户的土地和牲口都已经主动匀给别人，也不存在剥削压迫的历史事件，划成分时最富裕的是4户中农，没有阶级斗争。“没等土改东西就分给人家了，工作队很少到这里来，十天半个月不来一趟，咱庄上没有什么新的变化，他往这跑干什么。”“中农也允许参加农会，要是地主成分的你改过自新也允许你参加，那时候共产党的政策可宽了。”“划成分这个没什么，划什么就是什么，随便他划就是了，又不用蹲堆儿^①，又不用干吗的。”“我们都去外庄斗地主，老百姓都是跟着去，干部说怎么斗咱就怎么斗，老百姓懂什么，不就在那儿一坐，看人家开会呗。”土楼村是个相对传统又封闭的

^① 蹲堆儿：蹲监狱。

村庄，土改时因为已不存在大户，工作队员很少来，根据褚夫俊的讲述可知该村政策较松，没有阶级斗争，村民依旧靠血缘关系相连，大部分村民没有形成阶级意识，甚至缺乏对阶级的概念。

来自古邵镇文堆村的孙晋磊出生于1935年，1945年在本村读过两年私塾，后因土地改革运动的进行而中断。

土改前，孙晋磊老人家中有7顷多土地，主要靠收地租为生，“粮食五五分，柴火三七开，自家人并不种地”。当问到与村里人关系如何，是否会给予救济时，孙晋磊说：“那会儿不兴救济，你弄点儿粮食穷户忒多^①，旧社会和现在社会一样，他过得好还想更好，哪有舍得，都是只顾自己。”文堆村经济水平差距较大，富裕户与穷户关系疏远，穷户之间关系较为亲近。孙晋磊介绍说，土改工作队员进入村子只给穷户开会，把地主控制起来，然后就开始划成分斗地主。“那些工作队员都是趴山窝的老党员，都开会讲了，他来到就先给你灌脑子，不然那些穷户怎么敢这样的，都是共产党来动员的，天天开会，天天训脑子”“借给人钱，涨点儿利这就算剥削，穷的和富的哪有没矛盾的，穷的一聚堆那就上升到阶级斗争了。”文堆村的阶级动员工作充分，农民普遍被动员起来了，形成了较强的阶级意识。“那斗地主咱还能怎么想，他想怎么摆活^②就怎么摆活是喽。心里不好受也没法，那枪毙心里更不好受呀。”“刚开始保护富农利益，我记得。后来，第二次摆活的富农。后来连老中农都摆活，别说富农了。”据老人介绍文堆村的阶级斗争开展得较为激烈。

三 土地改革中阶级意识差异的理论分析

土地改革运动中农民的阶级意识是指由于农民成分的划分所形成的农民对自己阶级身份的认知和认同。通过上述古邵镇农民对土地改革的反映以及在土地改革运动中的表现，不难发现，阶级成分不同的农民在土地改革中有积极主动参与和消极被动参与两种不同的行为模式，反映出不同个体阶级意识的差异。在同样的社会大环境下为何会出现如此差异，下面将试对其进行理论分析。

① 忒多：指特别多的意思。

② 摆活：指摆弄、折腾、折磨的意思。